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 中國學術

2004 2 / 总第十八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5 No.2

# 中 國 學 術

送主



2004 2 / 总第十八辑

主编 刘 东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夏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总第18辑/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313-1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 - 中国 - 文集  
IV. 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1937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Ó XUÉSHÙ

**中 国 学 术**

总第十八辑

主编 刘 东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13-1/C·111

---

2005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1 插页 1

定 价：26.00 元

## 卷 首 语

一位优秀的编辑最近写信请假，要去埋头写博士论文。信中说：“我在《中国学术》这么长时间以来，读到了不少优秀论文，也听您和编务组其他成员给许多稿件挑过不少毛病，从中学到了不少为文之道，现在我真希望把这些都能用到我自己的写作中来。”对于已成长期重负的编务工作来说，这种意外的收获真是额外的精神补偿！由此又不免想到：其实正是鉴于在狭小的圈子之外，不可能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才要用编刊的方式来继续切磋“为文之道”。

论文栏第一组聚焦于可见或不可见的社会网络关系。裴宜理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抗议最活跃的时期（1919 – 1927 年）和在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上海，社会关系网和集体身份的角色是如何变化的。作为现代政治组织的国共两党，此时都亟欲推动本质上可塑的集体认同，然而，它们的努力却势必受到先此存在的社会网络的限制。作者指出，这种发生在政治渴望和社会真实之间的冲突，使得中国经验成为了一个理论创新的基点，来支撑对于有关社会网络的某些标准化假设的检思。孙江选取了另一个角度：通过分别爬梳西语、日语和汉语等语境中有关中国之“秘密结社”的叙述，来揭示秘密结社话语所涵摄的多义性与矛盾性。作者指出，是欧洲人创造了 *secret society* 一语来统称中国的异姓结拜组织和民间宗教教派，而在汉字圈里，与之相对的日语和汉语则分别是“秘密结社”和“秘密社会”。然而，无论在欧美还是在日本，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都深受其本国语境的影响。因此，只有剥离外加于秘密结社的知识/权力，解构“大写的”和“单数的”秘密结社叙述，才有可能把握性质和风貌各异的小写的、复数的秘密结社。

第二组聚焦于全球化时代的文艺思潮。史书美通过辨析不同的“认可机制”，来暴露虽潜在却顽固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作者指出，在学术论述和

文学市场方面的认可机制,至少有“体制的复活”、“寓言的时差”、“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鹤立鸡群的土产”和“后差异的伦理”这样五种形式,与此同时,作者便向莫瑞提(Franco Moretti)、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巴迪欧(Alain Badiou)诸家之说提出了挑战。由此可见,利用着此类微妙的文化机制,全球化文学阶段的非西方成员仍在被规训、约束和选择性地认可,故而“世界文学”的名义仍自掩盖着全球分裂的事实。相形之下,苏源熙则从另一侧面突显了文学全球化时代的问题意识。鉴于“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尴尬——缺乏一个高蹈于各文学共同体之上的中立参照系,他提出从“互动”来理解文学现象的范式转换。换句话说,他希望以“互动文学”来重新规范“比较文学”的使命,因为互动不仅是发生在各个文明间的普遍事实,也早已是各个学科中的主导思维。这样一来,逆反着对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理解,“国别文学史”并不应被视为正常的案例,倒应当被看成全球文学互动中的反常例外。

第三组聚焦于当代文化分析。李湛志和爱德华·利普马利用了晚近有关述行性及其对象化的哲学和语言学著作,并基于社会理论的语言学转换,把人类学探讨从礼物和交换扩大到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分析,从而描述了资本主义体系如何从以生产和公民状态为核心,过渡到了以“流通文化”和资本衍生物为核心。作者特别指出,风险的对象化,或者把风险转化为如商品般的流通之“物”,乃是这种“以流通为中心”的文化趋势的重要构因。郭军辨析了本雅明思想的一体两面:来自犹太教卡拉对神圣真理的阐释传统,以及经由卢卡奇阐释的马克思历史哲学;而如此不同的背景却在本雅明那里共同支撑起其终极关怀——对于历史的救赎。作者指出,基于上述精神传统的奇妙结合,本雅明历史哲学的主调就是批判现代性中的进步论,因为无休止的单纯技术进步无异于灾难,而真正的进步则应是人与自然的共同解放与和解。由此,他的史学方法便是“定格辩证法”,即打断历史的“无止境”进程,以便形成由无数未能实现的转折点共同构成的延续着的救赎传统,从而把历史看作一道弥赛亚随时可降临的门户。

第四组聚焦于佛教史料考证。方广锠论述了1974年发现于山西应县木

塔的辽代藏经的定名与存本。他在考察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应以版片为标准来命名刻本藏经，就此主张将这批辽刻藏经命名为“辽大字藏”，以更替此前习用的《辽藏》或《契丹藏》等称谓。作者还辨析了应县木塔出土的辽代刻经的版式，认为这批刻经中真正属于神秘《辽大字藏》的经卷只有七卷，而不是长期误传的十二卷。徐时仪指出《玄应音义》乃是一部未竟之初稿，其各本的异同依次表现在：收释的佛经互有不同；收释的词语各有不同；所释的释文详略不同。作者还考证出，各本之异同大致可分为高丽藏和碛砂藏两大系列，其中碛砂藏系释佛经 444 部，丽藏系释佛经 458 部，两相互补，共释佛经计 465 部，由此可证周祖谟《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所说有误。此外，《慧琳音义》共录玄应所释佛经 328 部，其中既有原文抄录，又有删补修订，比其他传本保存原貌更多。

评论栏中，王汎森基于历史研究的视角，从“得君行道与‘士为天下之共治者’”等六个方面，对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精义进行了评介。正如作者所总结的，此书指出，儒家对“内圣”与“外王”虽有倚轻倚重之分，但终极关心还在这个社会，故宋明儒并非认为只要在精神世界“先立其大”，紧迫的“外王”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如所周知，自从这本长篇巨著面世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围绕着它的内容而议论纷纷。相信此间进行的更知内情的学理分梳，有助于更准确地知晓该书的写作主旨。

通讯栏中，针对第十五辑王庆节的〈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一文，伍晓明撰文指出，警觉的对照阅读不仅要注意二者之同，亦须留心于二者之异。而一切比较研究所要面对的诱惑与危险则是，外表上甚至字面上的形同（海德格尔之“物”与老子之“物”）可能并非全是甚至根本不是二者之质近的可靠标记。作者对王文的具体质疑是：一方面，海德格尔以壶为例而论物之物性实乃在论“存在”（道），因此，对海德格尔所谓“‘四方域’物论”的讨论其实并无真正的文本支持；另一方面，老子之言“道之为物”其实也只是论说某种意义上必然不可道之道的一种表述方式。且老子这里也无任何所谓“自然物论”，相反倒只有老子之“道”方能比之于海德格尔之“物”。

最后再回到那个传承“为文之道”的话题。又将有一些学子要加入到编辑团队中来，正如也总有一些同事会转向别的人生目标。分别总是令人神伤的，特别正值你执着坚守的时候。借中国的老话来讲，我们的编务组里，或正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罢？——然而，大家所竭力呵护的学术事业，和借此而传承的道义理念，不正是在似水流年的映衬下，才显出了对于时间之腐蚀的抵抗，才厚重得如此令人敬畏吗？

刘东

2004年10月3日于京北弘庐

# 目 录

|     |     |
|-----|-----|
| 卷首语 | 001 |
|-----|-----|

## 论 文

裴宜理 上海的政治党派与大众抗议(1919—1927)：

|              |     |
|--------------|-----|
| 社会网络、集体认同与关系 | 001 |
|--------------|-----|

孙 江 话语之旅：关于中国叙述中秘密结社话语的考察 024

史书美 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 061

苏源熙 什么叫做“互动”美学？ 090

李湛杰、爱德华·利普马 流通文化 099

郭 军 本雅明的关怀 124

方广锠 《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 162

徐时仪 玄应《众经音义》版本考 190

## 评 论

王汎森 历史方法与历史想象：余英时的《朱熹的

|       |     |
|-------|-----|
| 历史世界》 | 219 |
|-------|-----|

## 通 讯

伍晓明 老子与海德格尔之近：“道之为‘物’”抑

或“物之为‘道’”？

——读王庆节〈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 238

## 书 评

|  |     |
|--|-----|
| 多米尼克·斯娜白:《公民的共同体:关于民族的现代观念》(张伦).....               | 268 |
| 杜赞奇:《主权与原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br>(席永春).....             | 274 |
| 弗格斯·米勒:《罗马、希腊世界与东方》卷一(宋立宏).....                    | 277 |
| 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任军锋).....                       | 284 |
| 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何俊).....                            | 289 |
| 陈 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吴震).....                           | 294 |
| 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宝森).....                       | 304 |
| 邓小南、高世瑜、荣新江(编):《唐宋女性与社会》<br>(定宜庄).....             | 310 |
| 罗香凝:《另类的现代性: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性<br>别向往》(宝森).....            | 314 |
|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br>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陈红民)..... | 317 |
|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br>(康长福).....             | 321 |

# Contents

|   |     |
|---|-----|
| Preface.....  | 001 |
| <b>Articles</b>   |     |
| Elizabeth J. Perry,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pular Protest<br>in Shanghai, 1919 – 1927: Social Networks,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Guanxi..... | 001 |
| Sun Jiang, A Journey through Discours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courses of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ese Narratives.....                     | 024 |
|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Its Mechanism of Recognition.....   | 061 |
| Haun Saussy, What is “Interactive” Aesthetics?.....   | 090 |
| Benjamin Lee & Edward Lipuma, Cultures and Circulations.....  | 099 |
| Guo Jun, The Concerns of Walter Benjamin.....   | 124 |
| Fang Guangchang, A Study of the Existing Version of <i>Liao Da ZiZang</i> and How It Acquired Its Name.....                                   | 162 |
| Xu Shiyi,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ditions of Xuying’s <i>Zhong Jing Yin Yi</i> .....   | 190 |

## Reviews

- Wang Fansen, Historical Method and Imagination: Yu Yingshi's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Zhu Xi*.....219

## Correspondence

- Wu Xiaoming, The Being-near of Laozi and Heidegger:  
    Dao as the Thing, or the Thing as Dao?  
—Reading Wang Qingjie, “Dao as the Thing:  
    Heidegger’s ‘Fourfold’ Theory of the Thing  
    and Laozi’s Natural Theory of the Thing”.....238

## Book Reviews

- Dominique Schnapper, *The Community of Citizens:*  
    *On the Modern Idea of Nationality* (Zhang Lun).....268
-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Xi Yongchun).....274
- Fergus Millar, *Rome,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East. Vol. I.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Revolution* (Song Lihong).....277
-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Ren Junfeng).....284
- Hoyt Cleveland Till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n*  
    *History of Thought in Sung Dynasty* (He Jun).....289
- Chen Lai,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rly*  
    *Modern China* (Wu Zhen).....294
-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ao Sen).....304

|  |     |
|--|-----|
| Deng Xiaonan, Gao Shiyu, Rong Xinjiang eds.,<br><i>Women and Society in the Tang and Song</i>        |     |
| <i>Dynasties</i> (Ding Yizhuang).....  | 310 |
| Rofel, Lisa, <i>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i>  |     |
| <i>in China after Socialism</i> (Bao Sen).....   | 314 |
| Wang Qisheng, <i>Party Members, Power and Power</i>  |     |
| <i>Struggles: the Organizational Aspect of the</i><br><i>Kuomintang Party during 1924 – 49</i> (Chen |     |
| Hongmin) .....   | 317 |
| He Guimei, <i>The Age of Transformation: A Study</i>   |     |
| <i>of Writers in the 1940s and 1950s</i> (Kang   |     |
| Changfu) .....   | 321 |

# 上海的政治党派与大众抗议(1919 – 1927)：社会网络、集体认同与关系

裴宜理(美国哈佛大学)

社会关系网是集体行动的基石。研究斗争政治的学者大都认为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动员需要利用当时的社会关系网络。<sup>1</sup>能不能组织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取决于组织者凭借现存的社会关系网鼓动人们参与的能力。社会学家罗杰·古尔德 (Roger Gould) 解释说：“要想让人们齐心协力地做一件事，此事所涉及的集体身份 (collective identity) 必须合情合理地按照现存的社会关系网对人们加以分类。”<sup>2</sup>无论运动组织者借来的是阶级、民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可能的概念范畴，他们所针对的对象“必须能够将自身的社会关系视为符合某种意识形态所隐含的抽象模型的具体个案；而且，他们还必须以同样眼光来看待同时代人的社会关系。”<sup>3</sup>这一论断的核心，是关系网络理论家所谓的“结构对等”，亦即，个人之间的群体关联之建立，其方式被认为是与其他群体相类似的，而不论这些个体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sup>4</sup>

1 古尔德：〈集体行动和关系网络结构〉(Roger V. Gould, “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1993]: 182 – 196); 戴安尼、麦克亚当编：《社会运动和关系网络：集体行动的关系理论》(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古尔德：《起义者的身份：从 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期间巴黎的阶级、社区和抗议》(Roger V. Gould,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第 18 页。

3 古尔德：《起义者的身份》，第 18 页。

4 瓦士曼、浮士德：《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Stanley Wasserman and Katherine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在从 1848 年革命到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的一路追溯中,古尔德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参与者的身份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认为参加 1848 年革命的巴黎人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争取劳动权利的,而 1871 年的公社社员却是为城市自治而战斗的公民。“起义者身份”(insurgent identity)的基础从阶级扩大到公社,这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巴黎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照古尔德的说法,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豪斯曼男爵 (Baron Haussmann) 在 1852 – 1868 年间所倡导的大规模城市革新计划的结果。公爵的计划将工人从城市中心迁移到新近并入的地区。在城市的外围,居住地(或“社区”)对社会关系网的建构产生了比职业(或“阶级”)更为重要的影响。而那些造成“动员规模迅速扩大”的正式组织的出现,也促进了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扩展。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历史上城市抗议最活跃的时期(1919 – 1927 年),在中国最充满活力的城市上海,社会关系网和集体身份不断变化的角色。这段时期发生的变化理应被视为与豪斯曼时代的巴黎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深刻,并具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影响。然而两者的起源和结果却大不一样。上海的关系网和身份发生改变,不是因为城市革新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调整<sup>5</sup>,而是由于那些寻求民主立宪的现代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党——的出现。尽管这些新出现的组织带来了公民集体身份的扩大,但它们也受到了既有社会关系的限制。政治追求与社会现实相互冲突的结果发人深省,我们必须以中国的经验为参照系来重新审视关系网络理论中的一些经典结论。

<sup>5</sup> 与巴黎不同,上海的人口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居住地更为集中。1915 年,上海的人口总数是 2006573 人,而 1927 年则增加到 2641220 人。不过,人口增长最多的地方不是华人聚居区(由 1173653 人增加到 1503922 人),而是公共租界(由 683920 人增加到 840226 人)及法租界(由 149000 人跃升到 297072 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90 页。

## 五四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两年，又在致力于群众动员的国民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根本性的重组之前五年。因此，五四可以被看作是一条衡量之后渐渐明朗的政治局势发展的基准线。

五四运动与其后的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并未受到任何政党的明显操控。约瑟夫·陈(Joseph Chen)写道：“孙(逸仙)和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sup>6</sup> 虽然五四运动发生时，孙在上海，可他只是个旁观者而非组织者。有些国民党党员(如邵力子)在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可他们是作为个人而非党员加入运动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上海的五四运动毫无组织。实际上，运动的迅速发展就反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动员网络的存在——这一网络的一部分在五四之前就存在，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从动员那些可能置身事外的人参与运动的角度看，当时最强大的网络依凭的就是那些有着长期城市政治活动传统的组织，尤其是同乡会和秘密会社。在1911年革命年代的上海，这些组织扮演了关键角色，组织领导人多显示出对新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发展的持续关注。

由于五四运动前就明显存在着社会关系网，所以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点历史背景。推翻满清统治的1911年革命，在上海得到精英阶层高度一致的推动。精英阶层的团结一致在革命前就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此即伊懋可(Mark Elvin)所说的“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机构”——1905年上海华人聚居区建立的市议会。<sup>7</sup> 市议会继承了行会、义庄和公共活动的传统，其

<sup>6</sup> 陈：《五四运动在上海：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话》(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Brill, 1971), 第23页。

<sup>7</sup> 伊懋可：〈中国上海的士绅民主，1905-1914〉(Mark Elvin,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 1905-14,” Jack Gray, ed.,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第41-43页。

目标在于实现“有限的福利国家”，那里不存在贪污腐败，人们可以在公共集会上公开论战，一切决定皆由投票多数通过。<sup>8</sup>

在辛亥革命中，市议会及其所属的商团武装（共约 3000 人）一致支持革命事业。<sup>9</sup> 商团武装在清廷地方政府垮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市议会的领导者自然而然地接手了清朝官员空出来的位置。当革命领袖之一陈其美 1912 年辞职时，市议会的要员控制了新的军事政府。<sup>10</sup> 例如，商团武装领导人李平书当上了民政部长。<sup>11</sup>

上海精英阶层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当时蔚然成风。上海的精英有些来自士绅家庭，但大多数是商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多是缘于同乡、同行或秘密会社的关系。这些关系网不仅在经济事务当中生发了亲密与信任，而且也促进了政治方面的齐心。1911 年革命前后上海活跃着八十多个政党；尽管他们都鼓吹公务，可多数党派都是以同省人的小团体为基础的。<sup>12</sup> 1911 年，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同时也是青帮头目）与其同乡浙江商人之间的关系是上海革命行动的基础。上海商人虞洽卿和王一亭——均为浙江人——都是陈其美的亲密伙伴。<sup>13</sup>

上海同乡组织的集体抗议活动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同法国的租界争

<sup>8</sup> 伊懋可：〈中国上海的士绅民主，1905 – 1914〉，第 52 – 54 页；伊懋可：〈上海的政府，1905 – 1914〉（Mark Elv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 1905 – 1914,”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 239 – 262 页。

<sup>9</sup> 伊懋可：〈中国上海的士绅民主，1905 – 1914〉，第 45、58 页；伊懋可：〈上海的政府，1905 – 1914〉，第 255 页。

<sup>10</sup> 伊懋可：〈上海的政府，1905 – 1914〉，第 255 页；伊懋可：〈中国上海的士绅民主，1905 – 1914〉，第 58 页。

<sup>11</sup> 福史密斯：《中华民国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人组织及政治，1890 – 1930》（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 – 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第 44 页。

<sup>12</sup> 邱钱牧：《中国政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97 – 354 页。

<sup>13</sup> 樊松甫：〈上海帮会内幕〉，《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 3 月号，第 150 – 159 页；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1911 – 1937》（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 – 19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 195 页。

端。<sup>14</sup>1905年,同乡组织发起了一场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对待中国之不公。十年之后,它们又因不满中日二十一条而组织了抵制日货运动。因此五四运动期间这些组织再一次承担了主要的动员工作,这便不足为奇了。就像布瑞纳·古德曼(Bryna Goodman)所说:“上海的五四运动中,同乡组织明显扮演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者、表达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如果不是它们,当时那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很难想象的。”<sup>15</sup>古德曼解释,“本省人的关系网”为人们通常认为组织了五四运动的、名声更为显赫的“现代”组织——例如,学生联合会和商会——提供了“构成要素”。<sup>16</sup>这一关系网络对分散的工人、学生和商人团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而且各团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正是运动的根本特征。

上文的意思并不是说五四运动——通常被看作中国“现代”政治的开端——仅仅是固定不变的“传统”组织形式的产物。实际上当时同乡组织自身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现代”同乡会开始代替旧式的会馆。新的组织越来越看重政治行动和社会动员,其结果在几年之后也即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将突显出来。<sup>17</sup>

另外一股影响当时重大转型的力量是上海青帮。由于青帮吸纳的对象是新到城市的移民,所以会受到人口变化和同乡组织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1919年正是据说蒋介石开始追随青帮“教父”黄金荣的那一年,蒋是由上海商人虞洽卿介绍给黄的。<sup>18</sup>这种关系预示了青帮将扮演更为重要的政

<sup>14</sup> 曼素恩:《上海的宁波帮及其金融势力》(Susan Mann Jones,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Elvin and Skinner eds., 1974), 第73—96页;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第22—24页; 古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同乡关系网络与身份,1853—1937》(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第158—169页。

<sup>15</sup> 古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第270—271页。

<sup>16</sup> 同上,第261页。

<sup>17</sup> 同上,第272页。

<sup>18</sup> 马丁:《上海青帮:政治与有组织犯罪,1919—1937》(Brian G. Martin, *The*